

史料选辑

第五辑

(内部发行)

—(146) 31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
南京市委员会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目 录

- 贾汪起义与一二二师行动经过的回忆………过家芳（1—29）
焦雨棠烈士传略……………金振之整理（30—32）
民革南京分会地下组织反蒋斗争活动纪实…胡勤业（33—45）
《灵甫》舰的部分人员起义的主要经过……高 光（46—76）
我参加辛亥革命和北伐讨袁的回忆
……………缪振鸿口述 顾凤敏 缪新亚整理（77—83）
我对孙中山先生奉安典礼工作的回忆………朱子炎（84—85）
我所知道的陈纳德和陈香梅……………黎成德（86—97）
回忆抗战时中央军校回族学生的情况…… 周文卿（98—103）
国民党军统在南京沦陷后干些什么………潘光祥（104—113）
徐恩曾是怎样当上国大代表的……………张 文（114—118）
余井塘竞选国大代表的丑剧……………徐恩庚（119—122）
我对杨淑慧营救周佛海的见闻……………丁绪曾（123—127）
汪伪政府的宣传部……………郭秀峰（128—132）
南京安徽中学简史……………李承勋（133—139）
陶行知“锄头歌”的产生……………邵仲香（140—146）
白泽民与“白敬宇眼药”……………白毓祥（147—151）
金陵回族伤科世家梁“接骨” ……梁全智整理（152—155）
南京清真寺简史……………杨为仁（156—169）
昔日南京夫子庙上风光……………俞宝书 王源恩（170—175）
南京旧货市场的变迁…刘文潮 汤燕生 曲功尚（176—184）
“爱字”美棉在乌江“落户安家” ……邵仲香（185—190）

贾汪起义与一三二师行动经过的回忆

过家芳

淮海战役刚开始，国民党第三绥靖区所属七十七军的一三二师和三十七师的十一团，五十九军的三十八师和一八〇师的全体官兵，共计二万三千多人，在中国共产党特别党员何基沣和张克侠两同志的组织领导下，认清形势，弃暗投明，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八日，在徐州以北贾汪地区运河线上光荣起义。从而敞开了徐州大门，接应解放军插入徐淮心脏，为围歼黄伯韬兵团以及淮海战役的胜利开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起义时，我担任一三二师的师长，经常与何基沣同志直接联系，秘密计议。现仅就亲身经历，追记起义经过一文。由于当时环境的局限，加之记忆不全，不妥之处在所难免，希知情者指正。

一、起义部队同我党的历史渊源

国民党第三绥靖区所辖五十九军和七十七军，原是旧西北军宋哲元部二十九军的一部分，曾长期受过冯玉祥将军的教育，是一支具有爱国爱民思想和不满国民党歧视控制的队伍。早在抗日战争初期，我党就派人对该部队进行工作，以团结、争取和教育他们共同抗战。

这支部队曾经参加过一九三三年保卫长城防线的喜峰口战役，在“七七”芦沟桥事变中英勇抗击了日军发动的全面侵略中国的新战争。在八年抗日战争中，他们一直在战争第一线，

多次与日寇进行殊死的战斗。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诸将军先后在战场上为国捐躯，官兵伤亡不计其数。他们的爱国主义行动，得到了我党的热情关怀和支持。一九三八年春，何基沣同志在对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强烈不满而深感报国无门之际，秘密到达延安，受到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中央首长亲切接见和鼓励，从而看清了抗战的前途，坚定了必胜的信心。后来，何向我党建议，给七十七军军事训练团派了政治教员（我任该团团长），培养了大批爱国青年干部，为部队充实了抗战骨干。何还协助七十七军开展抗战救亡工作，给予新四军以人员、经费、枪支和物资支援，并以“游而不击”的方式，避免同新四军作战。

在鄂西地区，这支部队与新四军共同抗战五年多，官兵们对共产党、新四军不仅有实际的认识，而且建立了较深的感情。他们认为新四军能与群众打成一片，是真正抗日的队伍。与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扰害人民的国民党军队对比，截然不同。这为部队后来逐步走上革命道路，奠定了思想基础。

抗日战争胜利，一九四五年八月，我部一三二师奉命到平汉线的花园受降。不久军部（军长何基沣）奉蒋介石指示，命令我率一三二师及三十七师各一个团，“清剿”安陆东北新四军的游击队。但我们以“游而不击”的方式，避免与新四军接触。同年九月，我到信阳向何军长汇报情况，谈到了国民党不顾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和平建国的愿望，阴谋发动全面内战，彻底暴露其妄想消灭共产党和“杂牌”军队的凶狠面目。同时，还谈到今后国共内战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要有所准备，趁接收敌人物资时，多搞些装备等。

当年十月底，蒋介石把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冯治安，后改编为第三绥靖区）调到徐州附近。大家意识到这一举动的用

意，是要把一些杂牌军队，包括收编的张岚峰、吴化文、郝鹏举、孙良诚一些伪军，用来打头阵、当炮灰，同共产党作战，以达到既消耗“共军”兵力，又逐步消灭掉这些军队，妄图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此时，何基沣、张克侠分别策动对张、吴、郝、孙等部，要他们在反蒋拥共的共同基础上联合起来，反对内战，维护和平。因时间仓促，情况复杂，加上这些旧军队内部的矛盾一时难以统一，未能成功。

一九四六年三月，为夺回被陈大庆部队窃夺的人民胜利果实，人民解放军发起向临城、枣庄一带的攻势。蒋介石命令何基沣同解放军作战，救援临城。而何迟迟不进，临城很快解放。蒋介石对何产生怀疑，撤销他七十七军军长职务，“升任”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这是明升暗降，剥夺其军权）。当年六月间，何去北平料理父亲丧事，见到了叶剑英同志（叶是在北平参加“三人调处小组”的中共代表），要求回解放区工作。叶讲了三条：一是希望何继续留在原部队工作；二是巩固部队，常与党取得联系；三是选择时机，在党的领导下坚决起义。叶还说：“这是毛主席的指示，也是党的需要。”是年冬，何带着党的指示回徐州，秘密地向我作了传达。我们即抱着坚定的信心，教育、团结部队灵活应付当时的局面，做好待命行动的准备。

二、起义的过程

（一）思想动态和组织准备

从一九四六年六月蒋介石发动内战起，到一九四七年十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大量地歼灭了蒋介石的由美帝装备的所谓精锐部队。蒋军内部由盲目狂妄转而万分恐

慌，失败情绪严重。在此期间，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冯治安部所辖整编五十九师和整编七十七师的四个整编旅，三十八旅于一九四七年夏，奉徐州“剿总”命令开往费县，不到一个月就被人民解放军围攻，三十七旅前往增援解围，未及到达，三十八旅就全部被歼，旅长翟紫封被俘后又被蒋机误炸身亡。三十七旅在途中也受到解放军的沉重打击，大部被歼。冯治安看到自己的队伍损失一半，要求“剿总”补充实力，并希望保持现存的一点力量，“剿总”也为暂时安抚冯治安和充实徐州守军，于一九四七年十月中旬，命令我旅（整编一三二旅）从韩庄、临城一带开进徐州，担任城防守备。徐州地区守备指挥官是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张克侠兼任。当时在徐州“剿总”所属的国民党部队被全歼或受歼灭性打击者已过半数，特别是马励武的整编二十六师和第一快速纵队，莱芜战役李仙洲的五个旅，以及张灵甫的整编七十四师被歼等，致使蒋军上层集团更为震动，各图保存实力，官兵精神颓唐，厌战情绪极浓。

一九四七年底，我旅恢复师的编制，仍为一三二师。“剿总”为了进一步控制我师，于一九四八年一月，从整编五十七师调来一个团，编属我师为三九六团。该团是蒋的嫡系部队顾祝同的老底子，军官多是军校毕业生，“剿总”想以此团来改变和分化我部。为了保持我师原有士气和进步力量，我们给该团调进副团长贾宗周、营长胡贺麟、副营长齐鸣皋、高增珠、王鸿略一批具有进步思想的骨干，逐步更换团、营、连干部，为起义作好准备。我还到营、连了解干部情况，鼓励他们把部队带好，要自力更生，不要怕当前危急困难的局面。

我们还在师、团中选择一些有自觉反正要求的干部，成立干部学术研究会，学习当时的政治形势。同时，还印发了解放军的政治教育和军事战斗的小册子，要求他们暗自学习，提高认

识，投靠人民走光明大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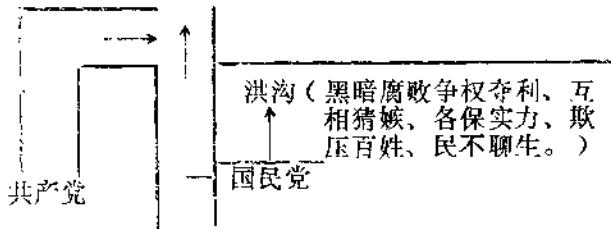
一九四八年七月，解放军发起了睢、杞战役，一举歼灭了国民党的区寿年兵团，解放了开封。我师副师长孙名泉和团长马秉正同志正在开封探友，他们回队便谈到开封解放后的见闻，如人民解放军的政策和军队纪律、军民关系等，分别向干部宣传。我们当时曾考虑，在解放军向徐州进攻时，我们就起义作内应。

七十七军军长王长海得知我师学术研究会的宗旨是反蒋的，于九月间下令停止活动。

九月下旬，继兖州解放后，吴化文部队起义，济南迅速解放。“剿总”刘峙深感震惊，徐州军警顿时紧张。他们一面宣传“徐州坚如磐石，后有重兵”，一面造谣诬蔑共产党有俄国人援助武器以及到处杀人放火等，造成市民惊慌，社会紊乱。此时，我曾对全师干部（包括伪政工人员）讲话。主要内容是：揭露国民党贪污腐化、欺压人民等罪行，指出其政府的腐败；戳穿他们诬蔑人民解放军的谣言，痛斥蒋介石仗持美帝打内战的卖国行为，说明国民党必败的原因。

经过教育，官兵们对美蒋无不愤慨。他们在苦闷中渐渐看到了光明，期待着未来的一天。为了教育大家分清是非，我并在黑板上画图说明如下：

世界大同



我们开展的上述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新观察》杂志曾刊登了这样一则新闻：“冯治安的部队防守徐州，谁能保证不出现里应外合、内外夹攻的形势，步吴化文的后尘呢？当局应深审之。……”

到九月底，蒋介石即以所谓为安全计，令冯部的全部家属南迁，地点在江南下蜀、高资、龙潭一带，不执行者以“通匪”论。这显然是蒋介石想以家属作人质来控制我们的行动。冯治安、王长海等一些高级人物，慑于蒋令，除将自己的家属财物急忙送往上海或他处外，也三令五申限各家属按期南迁。我同干部们研究，除有的家属可疏散隐蔽外，都可以去江南，到时可视情况分散，并派辎重营长王显之负责。还配有少校军医李亮云等医务人员，准备了米、面和经费。我的家属改换姓名取了第十一分监部的证明，到江南后即潜赴苏州，秘密取联系，并协助办理家属救济事宜。在部队离开徐州前，军官家属已全部疏散南迁。

十一月五日，我向何基沣同志汇报：“有的干部担心江南的家属生活困难，我虽作了些安排，怕难以持久。”何当时取出黄金一百两，交我用以资助干部家属。我干次日即派胞弟过家斌先带六十两，于七日在徐州挤上最后一列车安全渡江去沪，保证了家属的供应，稳定了官佐们的情绪。等到解放军胜利渡江后，所有家属才安全归队，与干部们团聚。当时剩余的金银，后都上交销帐。

一九四八年八月，蒋介石反动集团，对我更加怀疑，派国民党新闻总局副局长张某找我谈话，调查我部情况，询问我对时局的看法。我以不满的态度强调必须政治廉明，精诚团结，努力训练和各自为战应付之。

据原七十七军政治部（后改新闻处）主任陈天秩（大军渡

江时他任句容县长，与解放军有联系，率领县的武装部队起义）讲：一九四七年夏、秋，国民党新闻总局专员陈知一到徐州贾汪一带调查我的情况，他到七十七军新闻处找陈天秩，又到第三绥靖区找司令官冯治安及参谋长陈继淹，说过家芳是共产党员。陈与冯等都予否认，说我从小就在西北军长大，是子弟兵，人忠诚老实，还是陆军大学生。冯做工作后，还送了礼物，才算了事。我部撤出徐州到青山泉贾汪附近，国民党还派人（内有一少将）到部队明查暗访，仍不放心。

我师调出徐州，防务交李弥的第八军接替，不少营、团干部对此不满。特别是头几天，刘峙还向营以上干部说：“你们是坚守徐州的主力，大战快到了，我们还有几十个精锐部队，徐州之战，一定可以取得胜利。……”干部们提出：“为什么又很快把我们调开？这不是对我们怀疑吗？怕我们在城里作乱！”也有的讲：“人家说我们能打硬仗、拚刺刀，在外围能起更大作用，这不是人家的信任吗？”副师长孙名泉说：“事到临头，一付灵丹妙药，就可以起死回生。”我同副师长、师参谋长陈延昌和团长马秉正、副团长贾宗周、邓云鹤、钱宝钧等研究了当时形势，指出：大战在即，我们不能给他们打头阵当炮灰，要做好充分准备，把全部东西都带到前方，特别要做好官兵的联络工作，掌握部队，等待时机。大家经过充分考虑，精神振奋了，信心也坚定了。

为了争取冯治安，我向他报告此次调防准备的一切情况时说：“此次徐州之战，可能是决战性的，根据各地历次战役的经过和结果看，很明显，国民党有不可克服的根本弱点，想战胜共产党是不可能的。我们的部队，这些年已经搞得所剩无几了，不能走死胡同吧，应有个灵活的打算。请司令官考虑，是否将绥靖区存放在徐州的重要物资，趁我师离徐州时，多要点

车皮带到前方，免得将来情况紧急被封锁拿不出来。”冯沉思一会说：“研究研究再说吧。你们到前方管好部队。情况和地形你是熟悉的，这次把你调到前方也是为了加强防务，要注意戒备。”在离徐州之前，我连找他三次都未见到。听说他为了办理自己的家属和财物之事，不想见人，有的说他有意躲避不见等等。这说明他对起义的态度是不明朗的。

离徐前，我到军长王长海家里看望。他过去一向对我是信任的。一九四五年，整编一七九师撤销，我调到一三二师当副师长（还带一个团），他对我是既欢迎、又怀疑。王与当时的军长何基沣关系紧张，其原因：一是想当七十七军军长没当上。王是行伍出身，文化很低，无能无知，却以自己资格老，狂妄自大，看不起学生出身的何；二是他知道何曾因联共嫌疑被调送重庆审查过。在徐州要我解散学术研究会，对我也抱有戒心。有次我到他家看望，适逢有个姓马的算命先生（都称他“马仙”）给他算卦。王向我介绍，并叫马看看我的相貌如何。马看了我的手，摸了我的后脑勺后，高兴地说：“恭喜军座，你有这样一个忠臣来辅佐你，可保无虞，真是可喜可庆。”还接着说：“他面貌善良，头无反骨，真是忠良之臣。”我笑了笑说：“我是无能之人，只有跟随军座。马仙，你可看透我了！”此事想来实在可笑！不过，王虽然阴险狡猾，对我怀疑，但他迷信“马仙”，后在情况紧急时，未对我下毒手。

另外，我利用私人关系，向“剿总”第一补给区司令刘永琨（在南京陆大第十三期同学）要了一千支步枪和四十挺轻机枪运往前方。还买了些军用骡马，维修了汽车，购买了汽油，为起义做了一些物资准备。

（二）反动集团的惊慌失措和我们的对策

一九四八年十月七日，我师全部移驻贾汪、青山泉、柳泉

一带，作为军的预备队。师部驻青泉山。

国民党军队济南失败之后，在东北、西北、华北、山西、平汉线各战场，又接连被歼。到此时，广大地区获解放，国民党败局已定。但他们还不死心，想保住江南一隅，作垂死挣扎。于是决定把徐州作为南京的大门，集中重兵坚守，待机反扑。但实际上他们已人人自危，在各找后路，如五十九军军长刘振三早就丢下军队逃往上海，七十七军军长王长海大肆克扣军费，满饱私囊，搞得军心愤怒，民怨沸腾。干部们一致表示：命令一到，立即起义，坚决服从师长指挥。特别是原军训团和原一七九师的官兵们（曾受过共产党的宣传教育，同新四军第五师和地下党工作人员有过联系），要求起义更为迫切。

我到前方后，向何基沣同志（任绥靖区前方总指挥）汇报了部队调动、干部思想和起义准备等情况。他听完即嘱我：“形势日紧，要加紧做好骨干的工作。”并说：“这次行动是关系全局的大事，不能疏忽，要随时准备行动。”

在此期间，我和师的主要领导干部，积极地向一些营、连骨干进行宣传，并叫他们多联络一些同志，使他们认识到：大战将临，我们不能再忍受下去，不能为反动派打仗卖命，大家团结起来，等待时机，听从命令，前途是光明的。同时，我们还必须做好稳定部队的工作。

十月底的一天，师的新闻处长陈维新（湖南耒阳人，上面派来的特务）突然不见了，处里的人说他去徐州了，但事前没有报告。我对他素有戒心，认为他这次去徐，可能反映我对当前的不满情绪。过了两天他回来了。在官兵中散布：“青岛已有日本的二十个师团登陆帮助我们，南京又新到三十个师的美械装备，共产党总归要失败的。”我听了很恼火，就找他询问

出处，他说是听人家讲的。我痛斥他说：“八年抗战，对日寇的血泪仇、民族恨，我们还没受够吗？这种卖国行为，我们人民能允许吗？至于美械装备，再多也救不了我们。借美元用美械打中国人，这又是什么行为？你相信和愿意吗？”他红着脸，哑口无言。

十一月初，强大的人民解放军从鲁中南和济宁、曲阜一线向南推进。又听说郑州、开封已被刘伯承部占领。孙元良兵团已向徐州集中。反动头子们慌了，伪国防部参谋总长顾祝同，于十一月四日上午乘飞机亲临徐州。当天上午十时左右，冯治安从徐州来电话，要我即去开会。当时我同孙副师长、陈参谋长研究，考虑到头几天陈维新去徐州可能告密，去了怕被扣留，不去则怕敌人更生怀疑。经过反复思考，认为还是去的好，以防过早暴露。于是，我于中午赶到徐州都天庙绥靖区司令部，见五十九军一八〇师崔振伦师长也到了。下午二时，我们被叫到“剿总”参加顾祝同召集的徐州地区军长以上干部会议（因五十九军军长刘振三去沪治病，七十七军军长王长海身体也不好，就派我和崔参加），共有三十多人，会场的气氛阴沉郁闷。会议由刘峙主持，顾祝同讲话。顾讲话大意是：“前当我们虽然丢失了东北，损失较大，但华北还有我强大的部队可与共军周旋。至于中原方面，我方兵力大大优于共军。在交通运输补给方面也居优势。据各方面所得情报：陈毅、粟裕所部已由鲁中南、西南一带开始行动；刘伯承、邓小平所部在占领郑州、开封之后，也有东进之势。大战将临，此战的胜负，决定党国的命运。我们要趁共军屡经苦战、兵力疲惫、远途跋涉、粮弹补给困难之机，利用我们交通运输有利条件，组织大兵团，采取机动防御，捕捉有利时机，各个打击敌人。此次大战的胜利还是有把握的。我们的部署是：坚守徐州，在徐蚌之间

和共军决战。总统一再申明大义，说这是党国存亡关头，望各部队将领，接到命令，立即执行，不得有误。……”

会议结束，与会的人都向外走。“剿总”新闻处的秘书长吴一舟向我打招呼，要我坐下谈谈，问我近来的情况和对时局的看法。我还是理直气壮，本着以往的态度，对军队的纪律、士气和相互的关系，以及社会上出现的混乱现象等，表示了不满。还说：我们到前方缺粮饿肚，无钱买菜，官兵生活痛苦，怎么办？他听后说：“好，你辛苦啦！等几天我一定到前方看望你。”就此，我迅速离开“剿总”回到都天庙绥靖区司令部。晚饭后，冯治安找我和崔师长谈话，说：“现在的情况很严重。总统已决心与共军决战。准备集中五个兵团的兵力，在徐、蚌之间和津浦路两侧作攻势防御，这一战是党国存亡的关头。郑州、开封已放弃，海州也要放弃，黄伯韬兵团要向徐州靠拢。此外，还把李延年绥靖区撤销，另编成第六兵团调往蚌埠；把刘汝明绥靖区改编为第八兵团，调驻团镇。我们绥靖区的任务是固守徐州北面的大门，一定要鼓励士气，坚定信心……。”我说：“看当前全国整个形势和徐州地区的情况，总座对这一仗的前途怎么看法？有没有什么打算？”冯说：“形势难定，走着看吧！”我说：“马励武、张灵甫、李仙洲的部队不算弱；过去的济南、锦州、沈阳的兵力也不算少；还有我们的三十八师、三十七师，其结果又是如何？请总座考虑一下，能这样拖下去同归于尽吗？依我之见，形势紧张，要有个决断打算。”冯说：“你们不要着急，要好好掌握部队。今后五十九军要由你（指崔师长）负责，七十七军要由你（指我）负责。”他左手拿蜡烛（手在颤动，心已慌乱）照着地图，右手指着我们的防线及各部队位置，说：“你们回去要继续加强工事，严密戒备。”我和崔同时退出，我向崔（我在二十九军高级教导团的同

学)说：“在这紧急关头，我们的头儿还不为部队的前途打算，真是危险！我们决不能这样下去走死胡同啊！”崔同意我的看法，并表示我们多联系，走着看。

我连夜返回青山泉防地，总算平安无事。副师长、参谋长都很高兴。

十一月五日上午，我将徐州“剿总”会议和与冯治安的谈话，向副师长、参谋长等传达后，说：“大战迫在眉睫，我们必须做好行动的准备。我下午向何副司令官报告并研究具体行动计划，各位分头向团、营主要干部传达保持联系，并进一步了解下边的情况。”

(三) 预定起义方案及斗争过程

十一月五日晚，我到贾汪前方指挥部所见到何基沣同志(刚从徐州回来)，即把徐州会议和冯的谈话，以及我回师部当天的情况，向他作了详细汇报。何说：“党已派代表杨斯德同志于一日来此联系并检查准备情况，行动迫近，但准确日期还未定下，现在可作个起义的预定方案。”还说：“三十七师张团(一一一团)，现在韩庄临城以北，已有专人联络，团、营连的干部工作已做好，没有问题(该团原是从一七九师调去的，是我们的基础，三营营长王世江，二营连长冯志忠都是共产党员)。五十九军副军长孟绍濂说，他们的两个师长(三十八师师长杨干三、一八〇师师长崔振伦)也没有问题。”我们考虑，可能有阻力的一个是我师的三九四团长王仲元，他较顽固，又是军长王长海的内弟，对部队抓得也紧。另一个是三十七师师长李宝善和另外两个团，因时间太紧，均难以做工作。当时部队的态势：三十七师师部在利国驿。一一〇团(团长田雨村)从右翼沿六十子、顿庄闸运河之线布防。一〇九团(团长程立志)以一个营守备韩庄铁桥及其两侧运河之线，团主力在后

方并在微山湖东岸派有警戒。我师位置：师部在青山泉，直属队控制铁路线。三九五团（团长马秉正）在房上及其西北，可控制北面高地。三九四团在柳泉军部附近，其第一营（起义骨干，营长张宝山）配置在师部西北山坡要点，以对付军部及王仲元的不测行动。三九六团暂配置在微山湖边与柳泉之间。如五十九军方面万一有问题，三九五团可直取三十七师的一一〇团，迎接解放军在六十子、顿庄闸渡河。争取王仲元及王长海，如有问题，由三九六团及三九四团的一营对付。何基沣同志同意我的意见。我晚上回师部和副师长、参谋长研究第二天上午召开团长会议（三九六团只叫副团长贾宗周参加）的事项。会议主要是明朗情况，争取三九四团团长王仲元。

六日上午七时，我召开了团长以上干部会议，先讲徐州会议情况和两天来的情报，后谈我对决战的看法，让大家考虑如何打算。马团长一向对蒋不满，他在徐州时，曾受到蒋的嫡系部队胡琏的十八军和蒋纬国的坦克团、李弥兵团的第八军的歧视和欺侮，双方发生过冲突，后被压下，因此，早就憋着一肚子火。他说：“我们不能再忍受他们的欺压，不能再为他们当炮灰了。”副师长孙名泉说：“当前的危急形势谁挡得了？大家苦闷发愁，我看，只有一副灵丹妙药可以起死回生，就是不能打，要与共产党谈和。”陈、贾表示赞成，说：“这个仗不能打。”王仲元说：“情况是紧急，但是我们要听军长的，看看军长怎么办？”我随即说：“对，我正要向军长报告，请示他的意见，如何打算，回来再谈，大家回去作好准备。”

散了会，各团长骑马回去。我当时考虑日期未定，不能马上行动。此事如果王仲元先向军长报告，王长海必生怀疑，早期暴露会对整个行动不利。于是，我同副师长、参谋长、马团长议定：由我即乘车去军部，赶在王仲元之前，去争取王长

海。如被王扣留，家里就由孙副师长负责，向何副司令官报告，听何指挥，特别是师直属队和张宝山营要作好充分准备。

上午十时许，我到达柳泉军部。王长海正在召集副军长许长林、参谋长李延昭、副官长许炳亚以及各处处长开办公会。我叫副官告军长“有急事报告”，王听后即令散会召见我。我向他汇报了徐州会议和冯司令官讲的情况，还谈了两天内所得的情报。接着发表了我对战局的看法，说：“这个仗打下去可能是凶多吉少。我们的兵力少、武器差，只有一小条而单薄的运河防线，战线又长，面临强大的共军兵力，能守得住吗？万一有一、二点被突破，整个战局就受到影响，那时安全难保。不知军长怎样看法，有没有退一步的打算？”王说：“有困难，还有什么办法？我们只有服从司令官的命令，听总座（指冯）的。军人以服从为天职嘛，看总座怎么办。”我讲：“请军长还是多考虑一下，听说五十九军方面有什么风声。”他一听就沉不住气了，随即说：“我耳目闭塞，外边联络少，你可多打听打听，有什么事可向我报告。”我说：“好！”即退出。

我走出院外，到汽车旁，副官长许炳亚、参谋处长王继善，还有耿德星和几位处长，走过来围着我问这问那，探听消息。我简单地向他们讲了一下我考虑的问题，他们似有神会。我回师部后，即同各级干部对军部及外部的接触加强了戒备。

（四）关键的时刻 果断的斗争

十一月六日晚上，我到贾汪向何汇报一天活动的情况时，何谈了李连城同志（组织上派来的联络员，一九四二年曾随李先念同志任警备营长）下午向他回报的在徐州看到的一些混乱情况和与张克侠副司令官见面的情况。晚十时许，李连城突然进屋说：“组织已决定十一月八日下午开始总攻。望你部坚决行

动，让出防地，协助解放军从运河突入，向大许家、曾八集猛进，直刺敌人心脏，先截断黄伯韬兵团与徐州的联系，后集中兵力歼灭黄伯韬兵团。”何和我听后又惊又喜。喜的是长久盼望的时刻到了；惊的是时间急促，怕有所疏忽，影响大局。为了做到万无一失，我和何、李研究了行动方案，规定了我军识别记号（翻穿棉袄）和口令（“杨斯德”。杨是华野派来直接与何、张联系并指导起义具体行动的党代表）。诸事确定后，我同李连城同志于夜十一时许回青山泉，准备翌日拂晓前将李送往韩庄过河，通知张兆英团（一一一团）行动，向解放军领导汇报我们的准备情况。

我们走后，何立即电话告知五十九军孟绍濂副军长，交代情况及信号，要孟急作准备。

我回师部和副师长、参谋长研究了翌日的具体行动。由于极度兴奋，我虽连日疲劳，也难以入眠。既考虑部队的稳定，武器、弹药和车辆马匹等准备情况，也考虑部队行动起来可能发生的种种问题。正当我思虑重重，突然电话铃响了。我拿起话筒一听，是何基沣同志的声音：“哎！你是馨庭（我的字）吗？”我答：“是的。”“连城走了吗？”“还没走，快了。”“你这就同连城同志一起来吧。”接过电话，我即和连城同志乘车前往。

大约五时半，我俩到了何的住室。何见面便说：“出了问题了，你看怎么办？”我问：“什么事？”他说：“孟老夫子来说他们的师长还没同意呢，尤其是参谋长刘景岳坚决不干，处长们也不愿干，孟很难过，说他一辈子没丢过这样人，没脸去见共产党！我安慰他，要他速回再做工作。”我说：“当初不是谈清楚了吗？是不是发生了其他原因？时间已定，形势紧迫，不容许丝毫犹豫，他们不干，我们坚决干。到时我派一个